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工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研究

——以北京模式口街区为例

王少敏, 程正中

北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文章以北京市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工程实践为研究对象,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 对该街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首先识别了更新过程中的十类核心利益相关者, 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数据, 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通过对网络整体特征、个体中心性及局部子群结构的分析, 研究发现: 模式口街区的治理网络已形成一个以政府和国企为主导、专业团队广泛参与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与相关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 在资源整合与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 居民、商户等基层主体的网络嵌入度相对较低, 多方参与的格局尚未完全转化为均衡且稳固的实质性协同关系。研究最后指出, 尽管街区治理呈现出多元协同的趋势, 但仍需在网络制度化、主体权责优化和局部网络联动等方面进行深化, 以推动治理结构从行政主导向更深层次的多元协同演进。

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 城市更新, 利益相关者, 协同治理, 社会网络分析, 工程管理

Study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takeholders in Renewal Project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Taking Beijing's Moshiko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Shaomin Wang, Zhengzhong Che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文章引用: 王少敏, 程正中.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工程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研究[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6, 15(3): 661-673. DOI: 10.12677/mse.2026.153065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in the Moshik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in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stakeholder theor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to study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is district during its urban renewal process. The study first identified ten core stakeholders in the renewal process and collected data on their relationship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methods, constructing a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network.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centrality, and local subgroup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overnance network of the Moshikou district has formed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from professional teams.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occupy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playing a key role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 network embedding of grassroots entities such as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pattern has not yet fully transformed into a balanced and stable substantiv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 district's governance shows a trend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further efforts are needed in areas such as network institutionalization, optimization of stakehold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local network linkage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administrative dominance to a deeper level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Keywords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 Urban Renewal, 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的背景下,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逐渐成为城市更新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与一般更新项目相比, 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承载着空间整治和功能改善的任务, 也关联着历史风貌延续、地方记忆保存、街区生活维系以及多元利益协调。相关研究指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改造问题, 而是涉及政府、居民、经营主体、社区组织及专业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过程[1]-[4]。

既有研究从保护利用、参与机制和更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表明,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存在多元行动主体, 不同主体在利益诉求、参与能力和行动方式上存在差异, 街区治理效果与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密切相关[3] [4]。在此基础上, 一些研究开始引入网络视角, 认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践已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和网络化治理特征, 研究重点应从主体类型划分转向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模式[1] [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 该方法通过网络密度、中心性等指标揭示主体之间的联系结构与互动特征, 已被应用于历史街区保护及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研究, 并用于识别多主体治理中的结构关系[5]-[7]。从现有研究来看, 对更新情境下利益相关者关系结构的分析仍相对有限, 尤其是

多主体参与是否已形成稳定协同关系、不同主体在治理网络中的位置差异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此, 本文以北京市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 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识别街区更新中的主要参与主体, 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主体关系网络, 从整体、个体与局部三个层面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模式口街区更新在活力塑造与生态景观提升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8][9]。通过对其治理网络结构的分析, 本文旨在揭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的多主体关系特征, 并为进一步探讨协同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2. 模式口街区的社会网络研究

2.1. 模式口街区概况

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 是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 也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街区历史上为京西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传统街巷肌理和部分历史建筑, 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相关资料显示, 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 34.46 公顷, 2002 年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

近年来, 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工作的推进, 模式口逐步成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重要实践区域。自 2016 年启动修缮改造以来, 街区围绕风貌保护、空间整治、基础设施提升和公共环境改善持续推进更新, 2021 年实现开街运营, 街区更新由前期整治修缮逐步转向活化利用与运营管理。模式口更新不仅涉及历史风貌保护, 也涉及业态导入、街区活力塑造和社区生活改善, 具备较为典型的多主体参与特征, 因而适合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治理研究的案例。

2.2. 模式口街区网络数据收集

2.2.1. 利益相关者识别

社会网络分析所依赖的数据主要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数据。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本文综合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媒体报道、政策文本和项目档案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研究将 2015~2025 年界定为分析区间, 这一时期既是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更新与微更新政策持续推进的重要阶段, 也是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性更新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在此基础上, 本文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模式口街区更新实践, 对相关主体及其互动关系进行梳理, 形成模式口街区更新利益相关者识别清单(表 1), 为后续社会网络关系分析提供基础。

Table 1. Identified stakeholders in the renewal of the Moshikou district

表 1. 模式口街区更新利益相关者识别清单

利益相关者	具体主体	功能角色
地方政府(区/市级)	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街区更新总体策划、资源统筹、政策推动主体
	石景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批更新方案、资源配置协调
	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更新工程管理、施工监管、设施提升
街道办事处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批复主体
	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民诉求反馈、基层协调、地块更新意见收集
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	模式口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模式口东里社区居委会、模式口南里社区居委会、模式口中里社区居委会、模式口北里社区居委会、模式口西里北区社区居委会、模式口西里中区社区居委会、模式口西里南区社区居委会	社区居民诉求反馈、基层协调、地块更新意见收集

续表

原产权人/租住户	模式口村社区包含模式口大街沿线全域、28个文保院落、城建四公司宿舍、西山林场宿舍、区房管局代管房、综合厂宿舍, 常住人口1560户4222人; 模式口东里社区建有43栋居民楼, 常住人口1440户, 约4000人; 模式口南里社区建有21栋居民楼, 常住人口1668户, 4868人; 模式口中里社区环山坡而建的首钢职工家属院, 约4000余人; 模式口北里社区含13栋居民楼约884户居民; 模式口西里北区社区辖区含49栋住宅, 1666户, 5000余人; 模式口西里中区社区建有21栋楼房, 约4000人; 模式口西里南区社区1566户, 4479人	居民权益诉求、生活体验反馈、参与决策讨论
街区商户/经营者	街区内餐饮、文化创意店铺、咖啡馆、民宿等商户	市场经营者、业态创新载体、商业参与主体
工程实施单位	北京石泰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组织、工程实施与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管理单位	北京泰福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更新改造后街区运营管理、商业策划与招商
规划设计单位(规划/建筑/景观)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	规划设计方案制定、方案优化建议、设计技术支持
监理/造价/第三方评估机构	北京方圆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北京建宇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吉翔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市首都规划设计工程咨询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	质量、进度、成本控制与评估
文物与文化保护管理部门	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物局	文物保护规范执行、文物资源监管
文博单位/事业单位(文物所、博物馆、保护中心等)	法海寺文保所(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石景山区石刻博物馆(田义墓)、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等单位	文物保护技术支持、修缮方案研制
社会组织/行业协会	石景山区“老街坊”志愿服务队、驼铃古道志愿讲解团、模式口民俗工作室等组织	倡导监督、公众参与组织、议题推动
专家学者/科研院所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专家委员会(邱跃、田昆生、边兰春等)	专业咨询、评审论证、公共解释
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市/区级财政资金	资本投入支持、专项融资服务
公共服务与执法部门(公安、消防、城管、市场监管)	石景山区城管执法局、公安分局、消防救援支队、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安全、秩序、合规、经营监管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运营方(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	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对应市属公用事业单位实施	管线迁改、设施运维、环境保障
媒体与平台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	舆论监督、社会关注表达
游客/外来消费者	模式口游客及周边访客	街区文化体验者、消费反馈参与者

鉴于模式口街区更新涉及主体数量众多, 若完全按单一机构拆分易造成网络节点过多、问卷操作困难与数据稀疏问题, 本文在不改变治理权责结构实质的前提下, 对职能高度相似、互动模式趋同的主体进行类型化归并。例如, 将石景山区人民政府、石景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建委等统一归为“政府”, 将施工、监理、造价等企业统一归为“相关企业”, 将街区内多家商业经营主体统一归为“商户群体”。最终, 本文构建包含 10 个节点的治理网络体系, 分别涵盖政府(S1)、相关企业(开发建设、施工等)(S2)、规划设计团队(S3)、居民群体(S4)、商户群体(S5)、社区工作者(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S6)、相关领域专家(规划、文旅、街区更新等)(S7)、运营单位(S8)、金融机构(S9)以及新闻媒体(S10)。

2.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数据收集通过调查问卷法, 面向模式口街区更新协同治理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群体,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 线下问卷共发放 50 份, 共回收 48 份, 48 份问卷全部有效, 问卷有效率为 96%; 线上共发放回收 300 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为 284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4.67%, 线上线下总问卷有效率达到 95.34%。

为保证问卷数据格式统一, 便于后续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识别, 本研究对线上问卷与线下纸质问卷数据进行标准化数字编码。具体规则如下: 1) 基础信息题: 性别(男 = 1, 女 = 2); 年龄(18 岁以下 = 1, 18~25 岁 = 2, 26~40 岁 = 3, 41~60 岁 = 4, 60 岁及以上 = 5); 学历(初中及以下 = 1, 高中/中专 = 2, 专科 = 3, 大学本科 = 4, 研究生及以上 = 5); 职业身份(政府人员 = 1, 相关企业人员 = 2, 规划设计团队 = 3, 模式口原居民 = 4, 街区商户 = 5, 社区工作者 = 6, 相关领域专家 = 7, 运营单位人员 = 8, 金融机构 = 9, 新闻媒体 = 10); 参与程度(未参与 = 1, 轻度参与 = 2, 中度参与 = 3, 重度参与 = 4)。2) 针对线下问卷采用的 10×10 关系矩阵打分表, 与线上问卷题号一一对应编码, 非常疏远 = 1, 比较疏远 = 2, 一般 = 3, 比较密切 = 4, 非常密切 = 5。通过统一编码规则, 实现线上、线下问卷数据格式一致, 可直接合并用于后续实证分析。

2.3. 模式口街区社会网络模型建立

在模式口街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矩阵中, 对数据进行二值化处理: 值大于 3.00 代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比较密切, 记为 1; 相反, 值小于等于 3.00 则代表两者之间关系比较疏远, 记为 0。由此得到模式口街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二值矩阵(表 2), 将其导入 UCINET6.645 软件中, 并利用 NetDraw 工具实现网络的可视化(图 1)。

Table 2. Binary adjacency matrix of the Moshikou district network
表 2. 模式口街区网络二值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	0	1	1	1	1	1	1	1	1	1
S2	1	0	1	1	1	1	1	1	1	1
S3	1	1	0	1	1	1	1	1	0	0
S4	1	1	1	0	1	1	0	1	0	0
S5	1	1	1	1	0	1	0	1	1	1
S6	1	1	1	1	1	0	1	1	0	1
S7	1	1	1	0	0	1	0	1	0	0
S8	1	1	1	1	1	1	1	0	0	1
S9	1	1	0	0	1	0	0	0	0	0
S10	1	0	0	0	1	0	0	1	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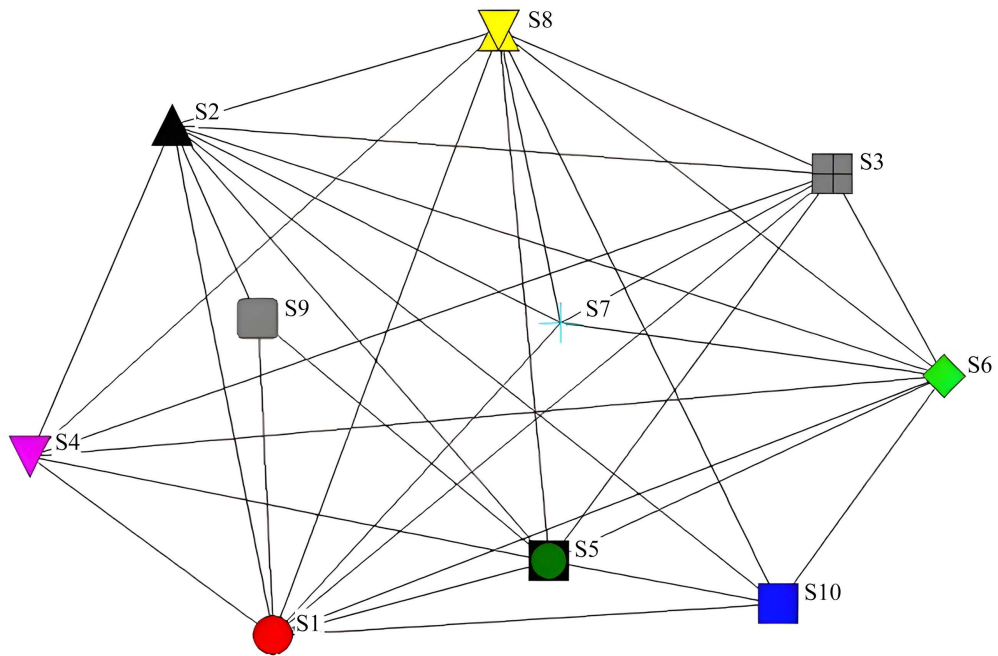


Figure 1. Visualization of the stakeholder network in the Moshikou district
图 1. 模式口街区网络可视化

2.4. 模式口街区网络指标选取

本文将模式口街区社会网络指标划分为整体网络指标、个体网络指标和局部网络指标三个层次(图 2), 整体网络指标用于把握治理网络的整体关联特征, 个体网络指标用于分析不同主体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与属性差异, 局部网络指标用于识别网络内部的子群结构及其联系特征, 借助三类指标, 为历史街区更新提供复杂社会系统的治理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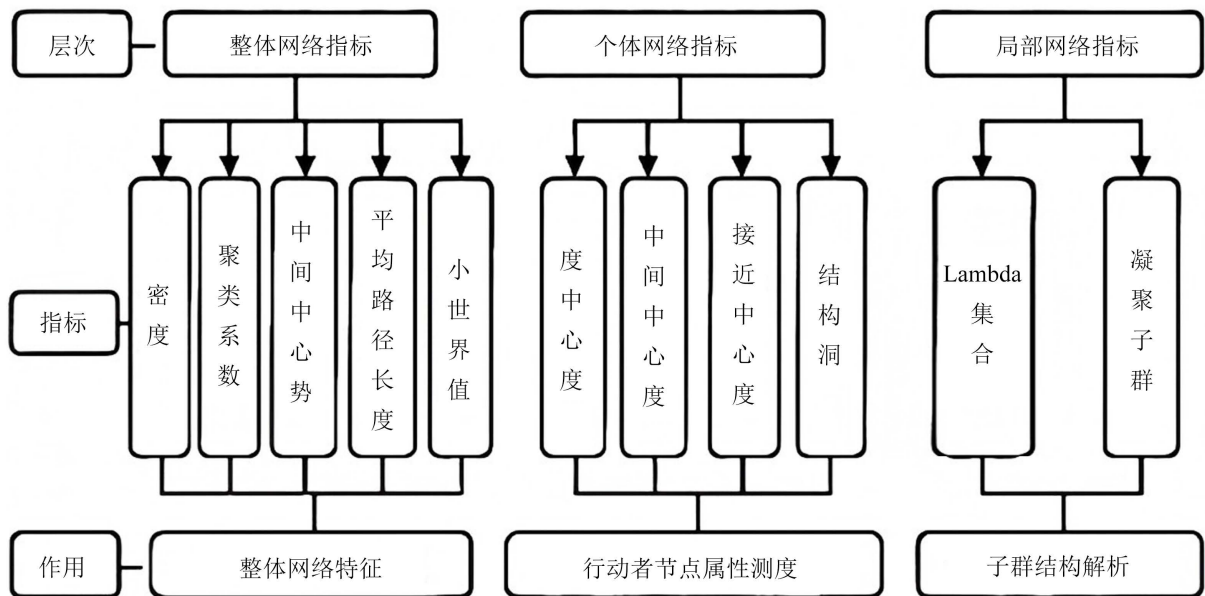


Figure 2. Social network index system of the Moshikou district
图 2. 模式口街区社会网络指标体系

3. 模式口街区社会网络指标分析

3.1. 整体网络指标分析

网络密度衡量整体网络中节点间连接紧密程度的指标,密度越高,说明网络中的连接越多越紧密[10],如表3所示,模式口街区关系网络密度为0.733,说明网络中各主体之间联系较为紧密,整体互动水平较高,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关系联结。聚类系数反映网络的聚集程度,值为0.801,表明网络内部存在较强的集聚特征,部分主体之间联系较为集中,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群体。中间中心势衡量整体网络对少数中介节点的依赖程度[10],其值为8.31%,说明网络整体并未表现出极强的单一中心控制特征,但仍存在部分主体在关系传递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平均路径长度代表了网络整体的联系度,平均路径长度越小,说明各个节点分布越紧密,可达性与联系性较高[10],平均路径长度为1.267,说明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路径较短,信息和资源能够在网络中较快传递。小世界反映网络中通达性与局部聚集性的综合表现,小世界值越高,网络内部结构越紧凑,信息传递越高效[11],小世界值为1.141,表明该网络同时具有较强的局部联系和较高的整体可达性,呈现出一定的小世界特征。总体来看,模式口街区关系网络联系较为紧密,网络运行效率较高,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部集聚现象。

Table 3. Overall indic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表 3. 关系网络整体指标

密度	聚类系数	中间中心势	平均路径长度	小世界值
0.733	0.801	8.31%	1.267	1.141

3.2. 个体网络指标分析

3.2.1. 中心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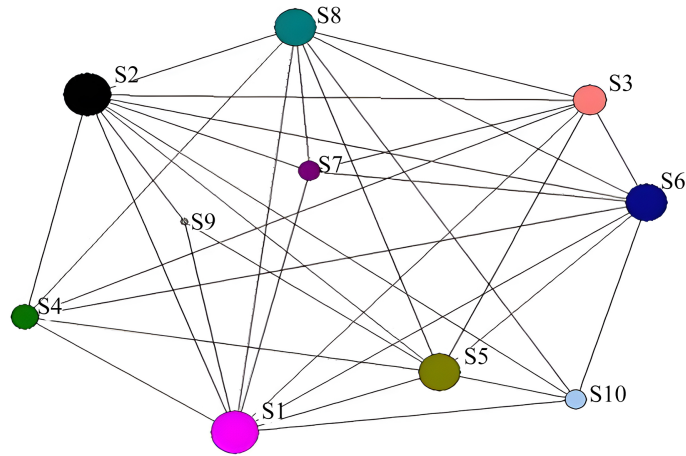
度中心度衡量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历史文化街区协同治理中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中间中心度衡量一个节点作为中介桥梁,连接其他两个节点的能力;接近中心度评估关系网络中节点间的可达性程度,反映节点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接近程度[12]。如表4和图3所示,政府与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最为突出,不仅与其他主体保持了较为广泛的直接联系,也在信息传递和关系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模式口街区协同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运营单位、社区工作者和商户群体的中心性水平也相对较高,说明其在街区更新实施、日常管理和基层协调中承担了较多互动任务,构成治理网络运行的重要支撑。规划设计团队与居民处于中间位置,表明其在街区更新中具有一定参与度,但整体影响力相对有限。专家、媒体和金融机构的中心性较低,更多发挥咨询、宣传和支持作用。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与企业居于网络中心,其他主体则围绕核心节点参与协同治理。

Table 4. Network central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4. 网络中心度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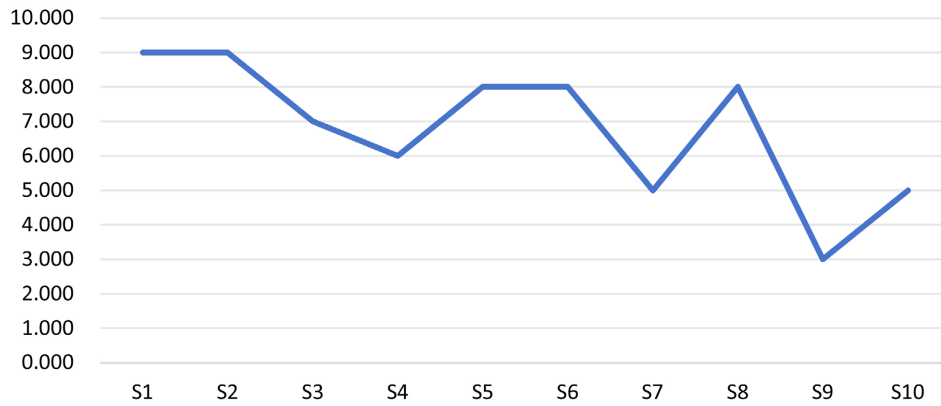
编码	利益相关者	度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S1	政府	9.000	7.783	100.000
S2	相关企业	9.000	5.450	100.000
S3	规划设计团队	7.000	0.800	81.818
S4	居民群体	6.000	0.000	75.000
S5	商户群体	8.000	5.233	90.000
S6	社区工作者	8.000	1.450	90.000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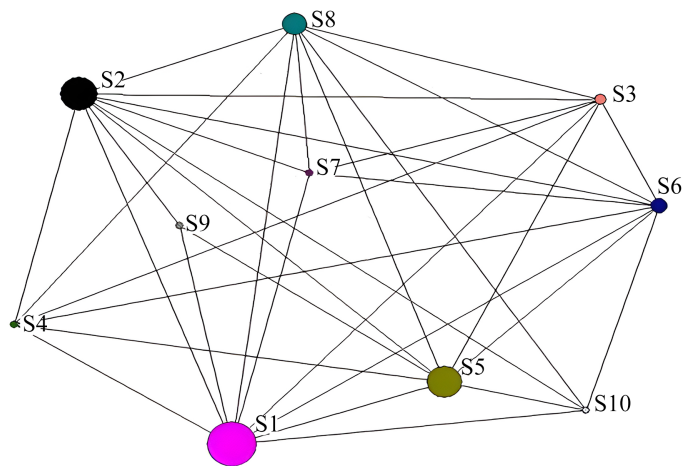
S7	专家	5.000	0.000	69.231
S8	运营单位	8.000	3.283	90.000
S9	金融机构	3.000	0.000	60.000
S10	新闻媒体	5.000	0.000	60.000



Degree



Deg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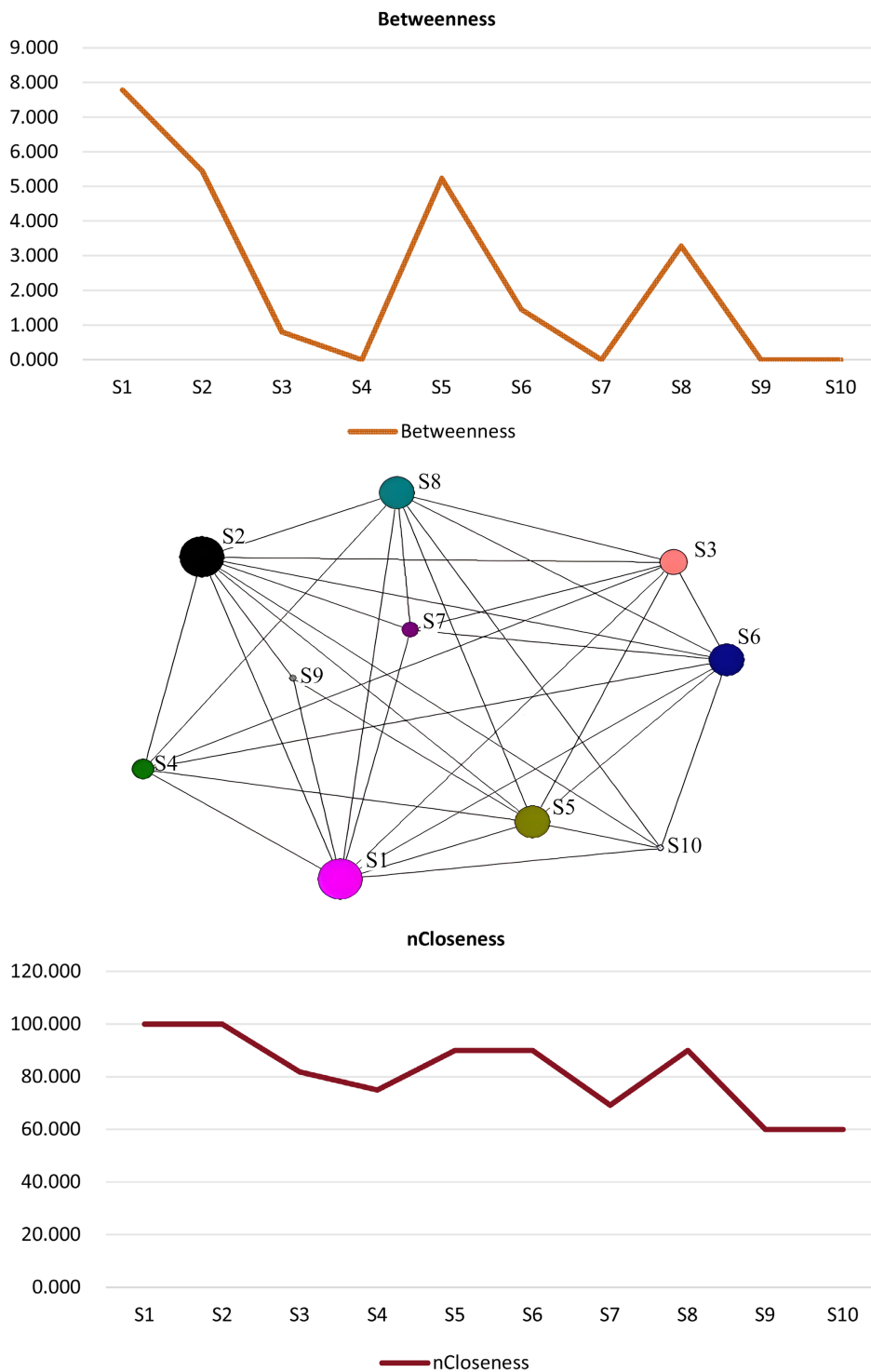


Figure 3. Network degree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closeness centrality network diagram
图 3. 网络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网络图

3.2.2. 结构洞分析

结构洞指标可测度节点间的非冗余关系，反映历史文化街区协同治理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各类主体受整体网络及其他主体的限制程度，网络中两节点间存在结构洞，即代表二者关系非冗余。其中有效规

模指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掌握的有效信息体量, 效率衡量网络中信息与资源的传递效率, 效率越高则该主体占据的结构洞越多; 限制度反映利益相关者受其他主体的制约程度, 可体现其自主决策的空间大小 [13]。基于 UCINET 6.645 的结构洞测度结果(表 5), 模式口街区利益相关者治理网络的结构洞优势呈现明显分化, S1 在有效规模与效率上均为最高且约束值最低, 表明其关系冗余度较低、能够接触更多非重复的信息与资源来源, 具备突出的跨圈层桥接与资源整合能力; S2 与 S5 结构洞优势同样显著, S8 与 S6 则表现为中等偏强的桥接能力。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structural holes in the network

表 5. 网络结构洞分析结果

利益相关者	有效规模	效率	限制度
S1	3.677	0.407	0.385
S2	3.441	0.382	0.397
S3	1.571	0.224	0.435
S4	1.000	0.167	0.442
S5	3.000	0.375	0.396
S6	2.233	0.279	0.427
S7	1.000	0.200	0.452
S8	2.500	0.313	0.413
S9	1.000	0.333	0.509
S10	1.000	0.200	0.457

3.3. 局部网络指标分析

3.3.1. Lambda 集合分析

Lambda 集合用于识别网络中关键连接关系及其稳定性, 反映局部网络的连接强度和分割特征[14]。由图 4 可知, 模式口街区协同治理网络内部存在较为清晰的结构分层, 节点在对外连接模式上呈现三组相对稳定的结构位置。第一组为核心协作圈, 由 S1、S2、S5、S6、S8 构成, 该组节点在树状图中较早聚合, 说明其对外关系结构相似度高, 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主体的联结方式较为一致, 构成网络运行的主要协作骨架。第二组为中间参与层, 由 S3、S4 构成, 其并入核心组的过程相对滞后, 反映其连接模式与核心圈存在一定差异, 但仍保持较稳定的治理参与和互动位置, 更接近协商参与与配合推进的结构角色。第三组为外围支持层, 由 S7、S9、S10 构成, 这些节点在树状图中较晚并入整体网络, 表明其关系结构与核心圈差异更大, 互动方式相对有限且更依赖核心圈的传导与嵌入, 整体上呈现支持性或边缘化的参与特征。

3.3.2. 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用于识别网络内部联系紧密的主体集合, 反映局部集聚和子群分化特征[15]。从凝聚子群分析结果看(图 5、表 6), 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并未形成规模较大的稳定子群, 而是以若干小规模子群和单节点子群并存为主。子群 3、子群 5 和子群 6 分别由两个节点构成, 说明网络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部联系, 但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少数主体之间的紧密互动, 尚未扩展为更大范围的群体协作。其余子群多为单节点, 表明部分主体在网络中的联系相对独立, 与其他主体尚未形成稳定的协同单元。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虽然已具备一定的局部集聚特征, 但子群结构仍较为分散, 网络内部尚未形成高度整合的多主体协作格局, 这也说明当前街区更新中的协同关系更多依赖核心主体的连接与组织, 而非多个子群之间的自主联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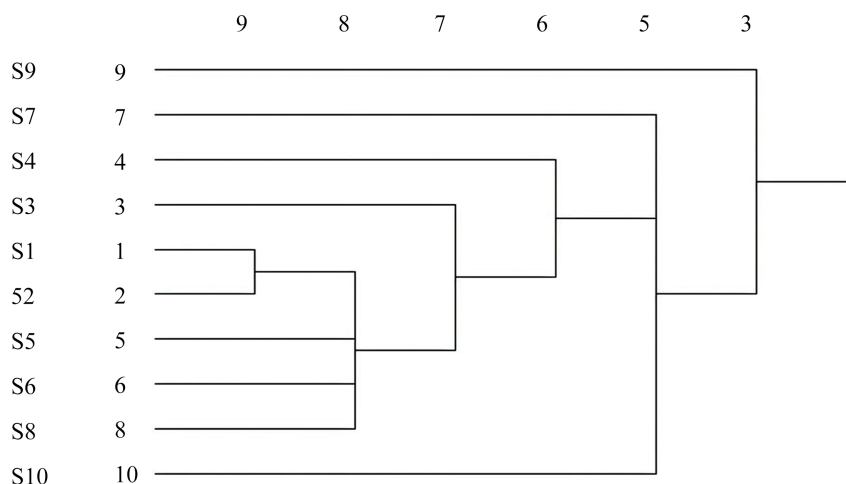


Figure 4. Lambda set analysis diagram
图 4. Lambda 集合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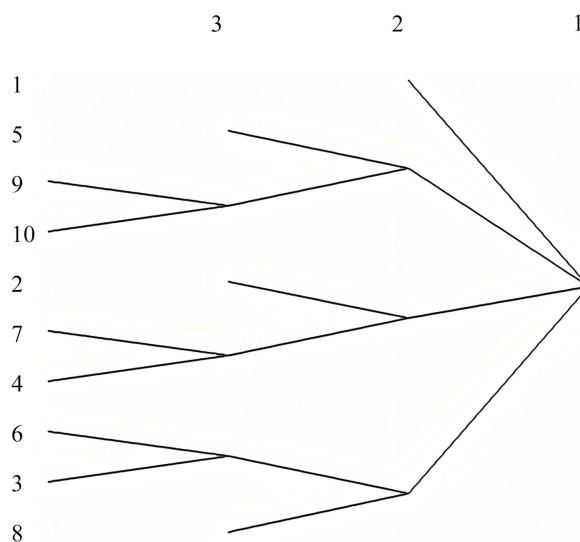


Figure 5. Dendrogram of the Moshikou district network cohesive subgroups
图 5. 模式口街区网络凝聚子群树状图

Table 6. Statistics of cohesive subgroup nodes in the Moshikou district network
表 6. 模式口街区网络凝聚子群节点统计

子群编号	节点范围	节点数量
子群 1	1	1
子群 2	2	1
子群 3	9、10	2
子群 4	2	1
子群 5	4、7	2
子群 6	3、6	2
子群 7	8	1

4. 结论与建议

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 模式口街区更新治理网络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多主体参与格局, 网络整体联系较为紧密, 信息与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具有较高流动效率, 说明街区更新并非孤立推进, 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协同关系基础之上。网络也表现出较强的中心集聚特征, 政府与相关企业处于核心位置, 运营单位、社区工作者和商户群体构成治理运行的重要支撑, 居民、专家、媒体和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嵌入程度则相对有限。局部网络分析进一步表明, 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虽已形成一定的局部联系, 但凝聚子群规模较小、结构较为分散, 网络内部尚未形成多个稳定协作单元之间的有效联动。模式口街区更新治理已经呈现出协同治理趋势, 但多主体参与尚未完全转化为均衡、稳定的实质性协同关系。这一发现表明,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的多主体参与并不必然导向深层次协同治理, 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加并不自动意味着治理关系的均衡化与稳定化。从协同治理理论来看, 模式口案例印证了“参与不等于协同”的基本判断, 即协同治理的关键不只在多元主体共同进入治理过程, 更在于不同主体之间能否形成持续、稳定且相对均衡的互动关系。从政策网络视角看, 模式口治理网络具有较高联结性, 但资源整合、关系协调和议题推动仍较多集中于少数核心节点, 呈现出“高联结但不均衡”的结构特征, 这类网络有助于提升治理推进效率, 但也可能限制边缘主体的深度嵌入和网络整体的长期协同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 模式口街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仍需围绕网络结构中暴露出的核心依赖、边缘嵌入不足与子群联动有限等问题展开, 并可从整体、个体和局部三个网络层面推进:

从整体网络层面看, 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已经具备较强的整体联结基础, 但网络运行仍较多依赖政府和相关企业等核心主体的组织与连接功能, 说明当前协同关系在较大程度上仍带有项目推动和行政牵引色彩。后续应在街区更新的规划、实施、运营和反馈全过程中, 建立常态化的跨主体协商平台、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重点推动政府、相关企业、运营单位、社区工作者、商户和居民之间形成更加稳定的制度化联系, 减少网络运行对少数核心节点的过度依赖。整体网络机制建设的重点, 不仅在于增强网络联系的密度, 更在于提高关系结构的连续性、规则性和可预期性, 使街区治理由依赖行政动员的项目型协同逐步转向制度化的长效协同。

从个体网络层面看, 模式口街区治理结构具有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 政府与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优势位置, 其他主体多围绕核心节点参与治理, 后续需要在保持核心主体统筹能力的同时, 进一步优化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和参与结构, 政府和相关企业应更多发挥平台搭建、规则协调和资源整合作用, 减少对治理过程的单向控制, 推动治理重心由主导推进向组织协同转变。尤其针对居民主体嵌入程度相对有限的问题, 应依托社区工作者和运营单位建立更加稳定的意见表达、议题反馈和协商回应机制, 使居民能够通过固定渠道持续进入街区更新治理过程。运营单位在街区更新实施、运营管理和多方衔接中具有较强的桥梁作用, 可作为连接政府、企业、社区与商户的重要中介节点, 承担跨主体沟通、议题转译与协同组织功能。对于专家、媒体和金融机构等支持性主体, 也应结合其功能特征, 分别通过专家咨询参与、公共传播协同和资源保障对接等方式增强其网络嵌入程度, 推动不同主体由分层参与逐步转向协同参与。

从局部网络层面看, 模式口街区治理网络虽已出现一定的局部集聚现象, 但局部协作关系仍较为分散, 多个子群之间缺乏稳定的横向联动, 说明当前网络内部尚未形成若干功能清晰、联系紧密且能够相互衔接的协作单元。后续应围绕街区保护、运营管理、社区服务、文化活动等具体议题, 分别培育由政府部门、相关企业、运营单位、社区工作者、商户和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的专题协作单元, 并通过联席协商、信息共享、联合行动等机制强化不同子群之间的桥接关系。局部网络机制优化的关键, 不仅在于增强子群内部合作的稳定性, 更在于提升子群之间的横向传导和协同能力, 使各类局部协作单元既能在具体议题上形成持续合作, 又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跨领域联动, 从而提升街区治理网络的整体整合水平。

综上,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的协同治理并不只是多主体的同时存在, 更在于不同主体之间能否形成稳定、均衡且持续的关系结构。模式口案例表明, 街区更新治理虽已由单一行政推动逐步转向多主体协同, 但当前网络结构仍表现出较强的核心依赖和边缘分化特征, 协同关系的制度化程度、参与结构的均衡性以及局部网络之间的联动性仍有待提升。这也说明, 多主体参与并不必然转化为实质性协同, 协同治理的深化仍需通过对关键节点关系、边缘主体嵌入和子群桥接机制的持续优化来实现。未来应顺应网络结构特征, 从整体网络的制度化整合、个体主体的权责优化与嵌入提升、局部网络的协作单元培育与跨群联动三个方面同步发力, 推动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的多主体参与真正转化为具有持续效能的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 [1] 时少华.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北京南锣鼓巷街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7): 61-67.
- [2] 时少华, 梁佳蕊. 政策网络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参与网络治理研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16(2): 47-53.
- [3] 顿明明, 赵民. 城乡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主体”辨识及政策启示——“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探讨[J]. 城市规划, 2016, 40(6): 74-81.
- [4] 顿明明. 苏州居住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及其策略应对[J]. 规划师, 2016, 32(7): 39-44.
- [5] 陆熹, 埃卡特·兰格. 参与式社区更新中的利益相关方特征和互动研究——以广州洋塘五约为例[J]. 风景园林, 2021, 28(9): 24-30.
- [6] 赵万民, 彭薇颖, 黄勇. 基于社会网络重建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以重庆市长寿区三倒拐历史街区为例[J]. 规划师, 2008, 24(2): 9-13.
- [7] 石亚灵, 黄勇, 郭凯睿. 历史文化名镇的社会网络保护量化研究初探——以重庆宁厂镇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6): 74-78.
- [8] 郭子薇, 吴晨, 张梦园. 不同复兴模式下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力驱动机制研究——以北京五道营胡同和模式口街区为例[J]. 北京规划建设, 2025(3): 169-175.
- [9] 王静懿, 饶红. 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绿色生态规划的生态景观提升思考[J]. 城市建筑空间, 2022, 29(8): 18-21.
- [10] 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1] 蒙小梅. 社会网络视角下广西圩镇社区公共空间适应性优化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18.
- [12]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M]. 北京: 格致出版社, 2014.
- [13] 李鑫.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数字政府协同治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25.
- [14] 邹兴泉. 虚拟学习社区中凝聚子群的互动行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 [15] 郑露莽, 熊子超, 伍江.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参与式社区更新治理绩效及机制研究——以上海新华社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8): 111-120.